

秦兆陽著

論公式化概念化

人民文學出版社

10079

化概念公式化論

秦兆陽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

一九五四年·北京

論公式化概念化

著者 秦光陽

出版者 人民文學出版社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經營許可證出字第0003號)

(北京市圖書編目委員會)

印刷者 機械工業出版社印刷廠

發行者 新華書店

一九五四年六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北京第三次印刷

書號(207) 字數99000 印刷 30001-33000

31"×43" 1/32 印張5— $\frac{9}{16}$ 定價5.100元

內容說明

這本文學論文集，收輯了「論一般化公式化」等八篇論文，分析了目前文藝創作中普遍存在的公式化概念化問題，並通過這一問題，對毛澤東文藝路線與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作了若干的闡明。

目 次

論一般化公式化	一
脫離生活硬編故事的傾向	二
論形象與感受	三
生活·思想·形象	四
略談素材與剪裁	五
環境與性格	六
理想與真實	七
過去與未來	八

論一般化公式化

×××同志：

—

自從中央人民政府頒佈了婚姻法以後，我們（「人民文學」編輯部）即收到很多反映婚姻問題的稿件（多數是小說，你這一篇小說是其中之一）。這些作品在主題思想上、故事結構上、人物性格的處理上，都是差不多的。

這些作品都是以反對封建積習、提倡婚姻自由為主題，故事結構大致上有如下幾類：寫一個窮寡婦，守寡多年，曾暗中跟一老實農民相好，因本家或村裏某些人的反對，不但不能公開結婚，而且不能來往，非常痛苦。婚姻法頒佈以後，由某一婦女幹部幫助，依法判決，終於結婚。

寫一個青年或中年婦女，因包辦婚姻，出嫁後受公婆虐待，與丈夫的感情也不好，

除了自歎命苦以外，沒有其他辦法。婚姻法頒佈後，因某一婦女幹部的幫助，得以離婚，並很快地跟另一人「自由」了，兩口子感情很好。

寫一對青年男女戀愛，爲父母所反對，或者是女方父母嫌男家窮，願把女兒嫁給一有錢人家；或者是女方父母嫌女兒「野」，甚至連村裏的工作也不讓她參加，當然更不允許她「自由」；或者是男方以類似的理由從中作梗。婚姻法頒佈後，同樣的由某一縣區幹部的幫助，得以結婚；而兩家父母聽了幹部的一段教育後，也打通了思想，結果是皆大歡喜。

這類作品沒有感人的力量，讀完了以後，很容易忘記。原因是這些作品中缺乏一些重要的東西。

它們缺乏一些什麼呢？

首先是：這些作者忘記了，婦女們的反封建鬥爭，特別是勞動婦女（因爲她們受壓迫最大）對於各種封建勢力的反抗，決不是從婚姻法頒佈以後才開始的。在老解放區裏，隨着革命形勢的發展和需要，實行過各種民主改革，曾經幾次頒佈過婚姻法令；共產黨和他所領導的民主政權，從來就是把解放婦女當做一項極其重要的工作，在推行各種政策時，總沒有忘記發動婦女羣衆參加，而反對封建婚姻制度的婚姻法令，則是解放婦女

的有力武器之一。至於一般新區，也因為反對封建束縛是一般婦女的自發要求，她們實際上也或多或少的有些自發的反抗行動，雖然因為封建勢力太強大，產生了不少的悲劇，但我們不應該忽略了婦女們這種頑強的反抗的性格，這可以從很多民間傳說和歌謠裏找到證明。然而這些作者却忘記了這些，他們割斷了歷史來寫婚姻問題。他們幾乎是千篇一律地把一些婦女人物寫得很軟弱，甚至很愚笨。這樣，這類作品激發鬥志（特別是對婦女）的力量就不足，引人同情的力量也很差。這類作品似乎不是主要的叫人去學習那些婦女的鬥爭精神，而只是叫人去可憐她們。因此，這類作品中所寫的婦女人物，是沒形象的，沒有熱情的，除了軟弱和不幸以外，沒有其他特點。

其次，這些作者忘記了，民主政府所頒佈的一切法令，都是關係廣大羣衆利益的，是從羣衆中來而又回到羣衆中去的。很多重要法令都是發動羣衆的有力工具，比如土地法、懲治反革命條例等等。婚姻法雖然意義不一樣，推行的方式自然也不同，但發動婦女却仍然是它的一個任務。這些作者却忽略了這一面，他們只是這樣寫：某一個縣區幹部採取「清官斷案」的方式，替某個婦女解決了問題，而不知道寫政府幹部如何宣傳婚姻法，婦女們為解決自己的問題，如何根據法令與反對方面進行說理——鬥爭，這一鬥爭又給社會環境以什麼影響。於是，就把婦女的覺悟性寫得不够，看不見新人物如何在鬥

事中成長起來，也看不見舊思想被打破、被消滅的生動過程，也就是看不見法令的深刻的社會影響，而只看到個人問題的解決。於是，作品就不深刻、沒有力量，成為一般化。這些作者寫婚姻問題時，就單純地寫婚姻問題，忘記了通過這一題材去反映人民的生活和社會變化。第一，一個婦女決不是孤立地生活着的，她有其社會聯繫，她的問題，在她周圍的社會環境裏會有各種反映。特別不應該忘記總有同情她的人，這些人是社會上的新生力量，特別是在老解放區，這一新生力量是很強大的。作品中有這樣的人物或輿論出現，可以看出社會上進步與落後兩種勢力鬥爭的面貌，而使得作品深刻化。第二，在婚姻問題上，受封建束縛最甚、痛苦最深的，多半是勞動婦女——農村婦女和工人婦女，她們要求婚姻自由的原因，除了男女雙方自然的需要之外，還有勞動生活上的和政治生活上的原因。比如農村中一個農民寡婦想找對象，往往是因為她在土改翻身以後，有房有地，但缺少勞動力，她想跟一個勞動很好的老實農民結合，這種結合對她個人和社會都是有益的（而反對這種結合，則是對個人和社會都是有害的），因此她的願望就更能引人同情，也就更增加人對封建思想的憎恨，作品的意義就更強。又如一對青年戀愛，也往往是由於雙方在勞動生活、政治生活中互相了解，然後才發生感情，其感情的程度，往往是由雙方熱愛勞動和政治上求進步的程度來決定的。這已經是今天存在於青年人中

的普通現象。忘記了這種現象，而單純地寫「男大當婚，女大當嫁」，作品還會有更多意義嗎？第三，這些作者或者是把舊的社會阻力過分誇大，寫成無人不在反對婚姻自主，想藉此以加強讀者對於男女主角的同情；或者是把這種阻力縮小到一兩個人物身上（比如女方的母親），而忽略了這一兩個人物的社會聯繫。第四，忽略了封建束縛對於婦女非人道的殘酷性，和它的階級本質的一面。當婚姻法頒佈以後不久，許多報章雜誌上不是刊登了很多婦女因婚姻問題被殘殺和虐待，以及婦女如何進行鬥爭的故事嗎？

自然，不能要求所有寫婚姻問題的作品都包括上述這些內容，可以根據不同的題材，由不同的角度、採取不同的重點來寫，有的可以強調寫某個婦女的頑強的性格，有的可以通過一個婚姻故事着重地反映新社會的面貌或新人物的成長。

至於你這小說，也是有上述同樣的缺點，只看見了一個簡單的一般的故事，沒有人物和一些別的有意義的東西。……

二

××同志：

小說「井」已看過。從來信所說的寫作經過，和原稿上字跡的工整看來，可知你寫

這篇東西是花了一番工夫的。但是你這篇作品並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並不是像來信所說的「文字上有什麼不妥」，或「題材有些過時」，而是由於犯了公式化和一般化的毛病；現在我就跟你來談談這個問題吧。

近一兩年來，我們收到很多寫工人農民生產活動的小說，其中相當大一部分其取材和結構大致如下：

村幹部領導抗旱點種（種棉花或花生），某個農民有頑固的靠天吃飯思想，不願挑水點種；另一農民則相信及時點種可以不誤天時；這兩個思想相反的人，或者是一家人（父子或母子），或者不是一家人，總之，他們在這個問題上發生了衝突。後來，天下雨了，點種的棉花活了，到秋天，得到了好的收成；這樣，當初反對抗旱點種的人後悔了，批評了自己靠天吃飯的思想。

政府號召多種棉花，兒子思想較進步，主張種棉，父親思想較保守，主張種別的莊稼，於是父子衝突不已。直到秋收後，棉花豐收，而且政府定的價錢很高，種棉得利，父親才心服兒子的遠見，思想轉變了，相信政府是真心為老百姓謀利益的。

土地改革後，農民剛分得土地，適逢天旱，政府號召合夥打井，農民們有贊成的，有不贊成的。某家，母子倆（或父子倆兄弟倆），兒子是互助組長，主張集資打井，母

親對打井沒有信心，怕不能出水，拿出糧食去（作為打井的資本）白糟蹋了，就一方面反對兒子的行動，一方面跟一些落後婦女計議抬龍王求雨，於是母子起了衝突。最後，井打成了，水流到自己地裏去了，同時又發現所謂「龍王顯聖」，原來是地主的造謠欺騙，於是母親受到了教訓，不再迷信和短見了。

工廠裏發動了生產競賽，青年工人熱烈參加，但個別老技術工人落後，認為「我憑技術吃飯，你不能把我怎麼着」，不願參加，還對一些年輕的思想進步的幹部（組長之類）忌妒，暗地裏慾氣。適逢要修理一部什麼機器，別的工人技術都不行，只有這落後的老工人行，但他又不願動手。結果：或者是工會幫這老工人解決了什麼生活上的困難問題，使他感動，因而動手修好了機器；或者是乾脆不找他，由某幾個積極分子拚命地研究，終於把機器修好了，這落後的老工人就轉變了，覺得保留技術是不對的。

工廠裏發動提高生產效率，某一進步工人提出一個辦法改進舊的煉鋼爐，使得出鋼快而好，但為另一落後工人所反對。於是，在領導幹部和一部分進步工人的支持下，開始試驗，經過了多次失敗以後，終因毅力、熱情、勇敢和智慧戰勝了一切，試驗成功了，生產提高了，落後的工人轉變了。

這類故事可以舉出很多很多，它們都有一個共同之點：作品中的人物一定有落後的

與進步的兩方面，兩者起對比或陪襯作用，文章就在「對比」上發生和展開。

我們不能一般地反對對比，像這樣的故事結構也並不是完全要不得，因為現實中本來就存在着很多這樣的事實，而且也確實有很多落後分子因這些事實而受到教育。

問題在哪裏呢？為什麼這些作品不能算是好作品呢？

首先，這些作者差不多是不約而同地、強調地寫落後人物的轉變，想借用這一「轉變」過程，來說明作者心中的一個概念——對農民說：不要靠天吃飯，不要迷信，不要不相信政府……。對工人說：不要保守技術，不要有單純技術觀點，而要關心政治，要互相團結，發揮你們的工作熱情和創造性……。彷彿作品中沒有落後分子的轉變，這些思想概念便無從表現出來，而作品也就沒有了教育意義，沒有了思想性。我們不反對寫轉變，因為現實中很多人都是從落後轉向進步的。但是我們不能忘掉一個更重要的事實：推動社會進步的、帶領人類前進的、使落後轉向進步的力量，是已經覺醒了的人和他的行動；也就是說：主要的是思想進步的新新人物，沒有這些新新人物，舊人物的轉變將是不可能的事。如果把寫作的重點放在新新人物身上，而把落後的人放在次要的地位；如果單寫新新人物，而沒有落後人物的轉變；也就是說：強調地寫新新人物如何帶領羣衆、克服困難、創造業績，難道作品的思想性就會差些嗎？難道進步人物的行為和心理活動不可能

說明不要靠天吃飯、要相信政府、不要有單純技術觀點等等概念嗎？難道強調地寫了新人物，那些思想落後的讀者讀了作品以後就不會受到教育嗎？

文學作品的社會教育作用，無論是配合當前任務也好，無論是寫歷史題材也好，其終極目的是要提高人的意識，像高爾基說的：「引人向上」。我們要更多更着重地寫真正模範的人物，使他們真正是讀者的榜樣，讓讀者去學習，讓讀者嚮往於新的崇高的品質，和於國家於人民有益的業績。

我們知道，劉胡蘭的母親並不落後，沒有成爲她的「對比」或「陪襯」。我們不知道郭俊卿、趙桂蘭、李順達、馬恆昌等等人物的家庭裏和周圍環境裏，是否有他們的陪襯者——落後的人物，但是我們所關心和嚮慕的是他們自己，我們從他們的事蹟中受到教育，而並不關心那些「對比」人物。

即或是配合任務的作品，如果很好地刻畫出了新人物的形象，等任務過去了以後，這作品還是同樣地能教育人，同樣有存在的意義。一篇配合「防旱備荒」的作品，它的更遠大的意義是黨的幹部們如何對人民負責，如何堅韌不拔地領導羣衆克服困難戰勝天災；這一點寫得愈深刻，作品就愈成功，意義也就愈廣大、愈長遠；雖然這作品裏也在次要地位上寫了一些落後人物的轉變，却也無妨。因爲讀者雖然不一定是農民，不一定

要參加防旱備荒，也不一定有靠天吃飯的思想；或者雖然現在旱災已經過去了，不需要防旱，但是讀者仍然可以從作品所寫的村幹部身上學到很多東西。

相反的，如果寫防旱備荒的作品，只是對那些有靠天吃飯思想的農民有教育作用，對別的讀者不能引起較深刻的印象，這就不是好作品。

以上是問題的一方面。

其次一方面，這些作者在觀察現實時，思考問題時，結構作品時，自己的地位站得不高。

茅盾先生在『關於反映工人生活的作品』一文中，有下面這樣一段話，是很值得我們參考的：

……它們都是從固定的一角來表現它們的主題，而不是總攬全局、鳥瞰式地來表現它們的主題的。

如果我們只從固定的一角來表現主題，那麼，作品中的人物儘管多，故事儘管繁雜，却依然不能達到我們所要求的思想性的深刻……。我們必須善於總攬全局、鳥瞰式地來表現主題。比方說，我們不把故事的背景局限於工場的一角，而把背景放在工廠委員會或工會，以這為樞紐而居高臨下、眼光四射地來組織故事和人物。比方說，我們可以不用一二積極分子帶頭的方式來描寫

一二落後分子的轉變，而從工廠管理民主化這樣大鬥爭大事件中來表現落後分子成羣的轉變。比方說，我們甚至可以不僅僅從一個工廠的增加生產等等角度上來寫落後分子的如何轉變，而是提高到從改造我們的國民經濟（把封建的半殖民地的經濟改造為新民主主義經濟）的觀點上，來寫落後分子的轉變。中國有一句成語，“大處着眼，小處落墨”，差不多就是這個意思。我們筆下所寫的，儘管還是局部，但我們胸中所蘊蓄，眼光所射及的，却是愈廣闊愈好，愈深厚愈好。

寫落後農民轉變的作品，大都只是從農民的個人私利上着眼，比如：因看見種棉得利，然後轉變了不願種棉的觀點，却不知道聯系到國家利益上去，不知道宣傳種棉花對於國家的工業發展有極大好處。當然，我們不應該忘掉一件事情對於羣衆的利益，但也不應忘掉它與國家利益的一致性。如果說這種觀點不能安到落後農民身上去——因為他即或是願意種棉了，思想也不一定會進步到這樣程度；但領導生產工作的村區幹部和一些積極分子，是應該有這種思想的。又比如：寫打井防旱，把旱地變水地，增加產量，落後農民看到這種利益後，就轉變了靠天吃飯的思想。但是我們的領導幹部和積極分子對這件事是怎樣的思想呢？他們應該站在為人民服務的立場，為國家增加財富的立場，即站在更高更遠大的利益觀點上來對待這一問題，而不僅僅是想到打井可以使農民得利。這實際上也就是說：作者應該站在這樣的思想高度上來看問題。

寫落後工人轉變的作品，也同樣的是眼界窄小。在工廠中，凡是克服某種生產上的困難問題，改進某種生產機構與技術，發動某種生產競賽，如果沒有領導，是不可能的。工業生產本來是最有計劃性組織性的。但是在這些作品中，只看到工人對某件事情的想法和態度，看不見領導方面的思想活動，即或是有領導人物出現，也是概念化的，他們只是對某件事情表示贊成或不贊成，沒有更多的觀念。這類作品中所出現的積極分子也是一樣，沒有崇高的理想，沒有對國家前途的樂觀主義精神，這些人物多半只是對任何事情有着一股幹勁，但性情很急躁，對共產黨感恩，如此而已。

正像茅盾先生在上述那篇文章裏所說的一樣：

難道這樣的落後分子和積極分子及其轉變的過程，不合於現實麼？當然不是的。千真萬確，這是現實。不過，社會生活要複雜得多，現實中有此一式，但不限於此一式。第一個把現實的此一式加以形象化的作家他受到了喝采，第二第三位可就沒有那樣的幸運了。第二第三位便不得不在生活中發掘出新的一式；他必得積累更多的素材，精密地加以綜合和提煉，和現實一同不斷地推陳出新。

「和現實一同不斷地推陳出新」，這是很重要的一句話。國家在飛快地進步，社會在飛快地進步，人和事都在飛快地進步，看不見「人」的新的意識的發生和成長，不會